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204期)

## 本期要目

- 网曝政府强行进驻格凸河景区，官方：等判决
- 景区运营 风光背后蛋糕难啃
- 泰山生态保护“有法可依”
- 给哈尼梯田一个怎样的未来？
- “一部手机游云南”关键要确保精准度
- 世界遗产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平台
- 数字技术与虚拟文物：是珍贵遗产的护卫者，还是文物灵光的剥夺者

2018年2月28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 目 录

## 热点关注

- 网曝政府强行进驻格凸河景区，官方：等判决 -----3  
景区运营 风光背后蛋糕难啃 -----5

## 新闻摘要

- 泰山生态保护“有法可依” -----8

## 社会纵横

- 给哈尼梯田一个怎样的未来？ -----10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精心设计和良好管理 -----14

## 时事评论

- “一部手机游云南”关键要确保精准度 -----16  
“旅游+”助力春节游 -----17

## 世界遗产

- 世界遗产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平台 -----19  
中国世界遗产城市的价值及其保护与发展的借鉴意义 -----22

## 环球博览

- 数字技术与虚拟文物：是珍贵遗产的护卫者，还是文物灵光的剥夺者 ----25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镜鉴（下） -----30
-

# 网曝政府强行进驻格凸河景区，官方：等判决

【大白新闻2018年2月26日】近日，一则“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政府封路接管格凸河景区”的消息引起大白新闻的注意。随后，记者联系到该景区原运营方贵州格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凸旅游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在合同履行期内，县政府直接收回其公司对景区的开发经营权。据悉，公司已经对县政府提起诉讼，县政府副县长回应称，该案将于近日开庭，相信法院会做出公正判决。

## 旅游公司：紫云县政府直接接管景区

大白新闻从格凸河景区官方微信获悉，该平台从2017年12月6日起，连发《关于格凸河景区正常开园的公告》《紫云县政府强行接管格凸河景区，现场一片混乱》《还原事件真相：“强行接管紫云县格凸河景区”》《中国商报法制版（转载）：紫云县政府强行收回格凸河景区经营权合法吗》四文对此事作出回应。

随后，记者从紫云县政府官网了解到，2017年12月12日，政府曾发出《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风景区公告》，公告称，“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已于2017年12月12日依法定程序及方式收回紫云格凸河穿洞风景名胜区的一切权益。自公告之日起，紫云格凸河穿洞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权、对外发布信息、公告权等相关权益都由紫云格凸河穿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统一安排、行使，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均不享有上述权益。”

对此，大白新闻联系到格凸旅游公司负责人之一邵某，对方表示，目前，该景区已由县政府在运营。其透露，2017年12月12日上午8点，紫云县公安、交警、武警等三、四百人左右一级级从外围封锁通往景区道路，除了当地村民，公司员工及管理人员已经无法进入景区。记者注意到，在旅游公司提供的当日景区情况录像以及照片中，可以看到景区内部出现了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和相关车辆。

邵某补充道，此前紫云县政府告知其公司，景区要升级打造，需修路并

封闭式施工，从而封闭景区。并发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要求重庆市华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腾空搬离相关事宜的通知》，其中表示“我府依约定权利已单方面解除协议，现通知你公司三日内（2017年12月4日）前腾空搬离，我府于2017年12月5日正式入场进行经营管理……”对此，格凸河旅游公司营销部经理回应：“对于这些文件，我们全部采取统一意见，就是不执行相关文件。”邵某表示，县政府进入景区将原有设备搬走，售票设备也被拆除。“里边还有几万块现金，现在都没取出来。”

此后，格凸旅游公司选择报警，据通话录音记录，紫云县110报警台表示，这个案子属于经济纠纷，可直接找法院。

据悉，自2017年12月25日，格凸河景区恢复运营。格凸旅游公司提供的一段暗访视频中显示，售票处目前并不提供发票。

### **政府说法：旅游公司没有履行好合同**

政府缘何收回景区？据了解，因安顺市推行“黄龙屯格”一体化为由收回景区。此前，当地电视台对此事进行过专门报道，县委副书记吴晓敏在接受记者采访解释：“我们是达成了一个协议，5年内分3期建设，投资2.4个亿，使格凸河按5A级的标准来建设。从审计结果来看，如今的投资只达到当时承诺的五分之一。”

对于政府方面的说法，格凸旅游公司的负责人邵某表示，2011年，紫云县政府与格凸河旅游公司签署了合同，2015年相关投资许可文件批复下来。邵某表示，在此过程中，公司多次向县政府去函以及进行书面汇报，希望按照公司的规划开发景区，政府未批准。

此外，景区管理处外联部副部长刘文虎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指出，目前景区建设离5A级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并指出多处景区内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对此，邵某表示，格凸河景区自2014年起连续3年列入“贵州100个重点旅游景区”建设中的前27个重点示范景区；2015年8月被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在成为4A景区3年以后才能申报5A景区”，邵某说。

### **双方分歧：政府赔偿**

据悉，在赔偿金额方面，紫云县政府找到审计单位对景区进行相关评估；同时，双方一块找到均认同的评估单位，评估公司针对此项目提供了一个大致的估值范围，在1.7亿到4.6亿之间。对此，邵某表示，紫云县政府不

接受评估结果，愿意退回旅游公司9600万投资成本，再补贴2000万。一方面，政府愿意赔偿自己认定的成本及补贴；另一方面，格凸河旅游公司坚持评估公司提供的赔偿估值，此事陷入僵局。

今天（2月26日），大白新闻联系到紫云县副县长吴晓敏，对方表示：“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不想再做解释。目前案子已经移交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马上就要开庭了。旅游公司的说辞我们可以理解，但我相信法院会做出公正判决，在此之前不便回应。”

（记者：王梅梅 统筹：陈威）

## 景区运营 风光背后蛋糕难啃

【新京报2018年2月28日】2018年开年以来，又陆续有企业签下合作协议，与景区达成开发运营合作事项。随着旅游资源开发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介入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而这也成为了迫切需要提高效益的景区的刚需。然而，看似庞大的景区运营市场背后，却依然潜伏着包括资源、合作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

### 旅游景区托管业务越来越受重视

日前，杭州商贸旅游集团与云和县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由杭商旅主导成立的云和梯田发展有限公司，将获得云和梯田8.02平方公里的特许经营权，项目总投资超6亿元。

据称，2016年丽水云和梯田景区已跻身国内单体景区千万级营收行列。合作开发启动后，该公司将以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目标，兴建景区配套服务设施等。自今年起，云和每年将获得800万元的景区特许经营费。在第3个5年期起，这一费用将每隔5年递增10%。按当地媒体的形容，云和将梯田旅游资源实现“出租”。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及旅游资源开发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介入。尤其是在景区同质化严重、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等背景下，借助第三方，实现升级转型成为不少景区的“硬需求”。

由此，包括华侨城、同程、巅峰智业等在内的多家企业纷纷于景区运营

领域布局。今年1月，华侨城与盘山景区签署了盘山景区委托管理协议。有数据称，2017年时华侨城已在全国范围内陆续输出管理20余家5A级景区。巅峰智业方面称，目前国内景区托管还处于起步阶段，从事景区托管业务的公司为数不多，其主营业务基本都是旅游策划、规划或者其他旅游相关业务，景区托管只是其派生业务。不过，旅游景区托管业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

### 60%的市场规模留给企业的空间不如预期

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国旅游景区“十二五”发展报告》显示，截至期末，国内A级景区数量已达到7951家。另据旅游专家魏小安的数据统计，国内景区数量已超过2万家，其中占总数1%的5A级景区占据了国内30%-40%的市场总规模，剩余99%的景区仅占60%左右。可见，景区运营市场潜力巨大。但有相关从业者直言：“一流的景区资源已经没有空间，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业内人士看来，景区运营留给企业的选择余地并不如想象中优渥。

“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但一般是涉及景区的个别项目。完全托管原本的事业管理型景区，住建部等部门曾经是严厉禁止的；且针对住建部门主管的风景区，至今也没有完全松口。”北京联合大学旅游产业研究所所长张金山表示，当前景区托管市场的现状，其实是当地在缺乏资金或为了新增旅游景区的情况下，才有的委托的需求。

也因此，景区在选择开发运营企业时通常立足于能否对效益带来有力提升。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张凌云表示：“一方面，景区需求旺盛的话，即便在管理层有提升空间，也会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很多景区则是基于市场、渠道不行，需要企业带客把收入提高，这就在立足点上产生了差异。”

然而，旅游目的地通常都是需要多年积淀的产品。张金山进一步表示，因此部分企业介入时，并非冲着景区门票等收入，而将重点放在了地产项目开发上。一名景区运营投资企业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该企业不久前刚在海南拿到地。

### 项目运营问题频发

在一流景区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景区运营企业，尤其是重资产模式的企业，在项目目标的选择上就显得尤为慎重。中景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平表

示，中景信选择项目的标准是必须具备稀缺性，能够将其作为吸引力，打造旅游产品。传奇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陈宗冰则表示，希望可以令一些传统的知名景区做好景区体验，提升景区产品质量。

然而，在景区实际的运行开发中，依然难以避免问题的发生。有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其公司一度看好的景区项目，便因各种原因在开发过程中受到了影响。据了解，在前期考察时，该项目便以其特色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其后，该项目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企业在后续的旅游目的地开发过程中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该景区交通并非十分便利，而公司在考察时了解到的交通建设计划，后续也出现了迟滞，进而影响到了企业运营。“这个项目我们在选择上没有失误，但后期仍承载了一定的风险。”该名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我们在选择资源上会进一步谨慎，例如交通。”

此外，由于景区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的理念、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分道扬镳的案例也时有发生。见学中国分析指出，从近几年国内景区托管情况来看，已经出现多个签约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终止双方合作的托管案例，如海南五指山黎峒文化园、四川阿坝桃坪羌寨、河北定州古城等项目，都是相关的托管公司（机构）在托管签约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终止了双方的合作。

### **轻资产输出很难成为有效的景区运营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年轻资产模式大行其道，也同样成为景区运营的重要模式之一，并被业内预测为今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市场。然而，目前起步阶段的国内景区运营业务，能否有效输出管理仍需要打上问号。

2016年底，中青旅发布公告，宣布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桐乡乌镇景耀旅游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桐乡市乌镇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乌镇旅游景区业务的持续投资及轻资产管理输出模式的平台之一。港中旅则表示不考虑大量投资的方式，并计划未来以轻资产方式，通过收购景区经营权实现控股。重资产模式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有目共睹。然而，轻资产输出能否成为目前切实有效的景区运营模式呢？

“很难。景区体量一般很大，景区性质和景区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利益主体牵扯很多，不像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模式，容易复制或者连锁。”张

金山表示。张凌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景区比较复杂，很难出现标准化管理。现在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敢说我能管一个就能成功一个，很多成功案例都属于个案，很难推广，有些甚至连自己投资的景区都没有做好。管理输出，关键是团队，而不是运营公司的品牌。”

（记者：郑艺佳）

## 新闻摘要

### 泰山生态保护“有法可依”

【中国建设报2018年2月7日】历经两年20余次调研、座谈和30余次修改，山东省泰安市首部实体性法规《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过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查获批复，将于2018年5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的出台，为加强泰山景区生态保护宣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培育市民生态环保理念打下坚实基础。

“最初这部法规的题目是《泰山管理条例》。后来我们经过多方论证、考察，认为在泰山的保护管理中最重要的是生态保护问题。因此，在全国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我们将法规题目更改为《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生态保护的涵义，不仅限于对泰山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还包括文化、文物、人文历史等方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条例》设五章四十五条，对泰山生态资源的保护措施进行了细化和丰富。如第十四条规定对在泰山景区内禁止从事的活动进行了细化。第十五条规定了建立生物多样性信息监测网络。第十六条规定了按照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方式合理配置植物群落。第十七条规定了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第十八条规定了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定期普查、监测、登记造册，建立保护档案；设置标志牌、保护栏、电子监控、语音警示等防护措施，对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唐槐、汉柏、望人松等特别珍稀的古树名木定期监测，实行一树一策、一树一档；对树势较弱的古树名木通过生物、物理和机械等措施复壮。第十九条规定了泰山景区为森林防火区，实行全年森林防火，禁止携带火种进入泰山景区；泰山景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应当合理划定禁火期和禁火区，并向社会公布；在禁火期、禁火区内，禁止吸烟、点火、烧香、燃放烟花爆竹或孔明灯等。第二十条规定了泰山景区倡导文明祭祀，除管委会指定场所外，禁止焚烧纸、香、烛等祭祀用品。第二十五条规定了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第二十七条对环境卫生保护进行了规定。

泰山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科科长杨振华认为，《条例》是对泰山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进行了法律确认。“此外，《条例》还创新性地规定了大量内容，填补了原有法律规定的空白。”他举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加强对泰山山体的保护，对已遭到破损或存在破损隐患的泰山山体，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及时修复治理，修复治理不得对区域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同时规定了最高50万元的罚款。而对于泰山石资源的保护，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泰山石等地质遗迹的保护，完善保护标志和禁采警示标志，建立保护长效机制，禁止从事开采泰山石等破坏景观、植被、地形地貌的活动。

“这些都是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条例》考虑到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注重了泰山人文生态及文化传承。”杨振华说，《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管委会应坚持泰山景区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和谐共生的原则，建立健全泰山景区人文资源的调查、监测、评估和修复制度，明确保护范围，制定了多项保护与管理措施。

此外，《条例》还将每年的6月9日规定为“泰山景区生态环保日”，强调通过各类媒体，加强对泰山景区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文明旅游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社会公众的生态保护和参与意识。“通过设立生态保护日，让泰山保护具备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让离泰山最近的泰安市民参与其中、形成合力。”参与《条例》制定的一位专家表示。

（张中乾）

### 给哈尼梯田一个怎样的未来？

【新浪看点2018年1月28日】申遗成功之后躺在功劳簿上，只见开发、少有保护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能不说是申遗的“流行性保护后遗症”。哈尼梯田精密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社会系统、人与自然互动的模式，经得住这样的冲击吗？又需要怎样的保护与发展道路呢？

#### 从未面对的复杂的梯田遗产

2013年，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所有人在惊呼它的美景的同时，几乎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申遗成功之后，路该如何走？

与古建筑、古遗址、古化石这类遗产不同，哈尼梯田价值核心不仅仅在于村寨、建筑的审美价值，更在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这是哈尼梯田得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核心。

保护哈尼梯田，就必须保护其完整的社会体系，保护其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价值观，保护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以及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只有对哈尼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才能延续哈尼梯田的世界遗产价值。可以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梯田，更是哈尼社会的全部。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而无奈的事实。我们从未面对这样复杂的遗产。它与人息息相关，没有人耕田，哈尼梯田就不复存在；它的绝世美景使其价值独一无二，却也成为全球化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压力对于其生态脆弱性、传统社区价值观的冲击将史无前例，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也使经济模式、劳动力结构面临着巨变的前夕。

可以假想，如果村寨发生“空心化”，那么谁来耕田？当农民感到在梯田里劳作，远不如搞旅游的回报时，还愿意在梯田里辛苦耕作吗？假如旅游公司把这些梯田租赁下来作为资产经营，村民成为员工，耕种沦为表演，延续千百年的社会关系、组织发生巨变，这种文化景观有何意义？文化传承从何谈起？

#### 前所未有的保护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尼梯田的价值如何延续？承载价值的遗产本体、环境、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延续？会不会一个链条的崩溃引发整体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样的变化会不会直接导致遗产的消失？虽然在2012年，我们申遗文本与管理规划团队，通过对现场的评估，得出了传统保护机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现状保存良好这样的结论，但是面对未来的加速发展，特别是申遗成功之后带来的改变，我们并非没有忧虑。同样，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专门评估机构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在哈尼梯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缔约国提供可持续保护的策略与规划，并在2015年世界遗产大会讨论，这是哈尼梯田得以列入世界遗产的条件，也是缔约国必须完成的承诺。

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保护难题，传统的文物保护思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哈尼梯田的要求。这需要经济学、社会学、农业、生态、环境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更需要政府部门、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的群策群力。

### 哈尼梯田发展的全方位视野

#### 改善经济结构

农业——农业的增收直接与村民收入挂钩，并且有益于遗产的保护，是哈尼梯田发展的根本性策略。以有机农产品带动传统农业发展，使农业经济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体，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农民直接受益于耕作，这是梯田保护的原动力。

目前遗产地在积极培育梯田产业品牌，引入市场机制推广种植梯田红米等生态产品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未来，如何扩大资金规模、引入人才、做大做强，进一步打开市场，形成品牌优势，使遗产地的农户全面受益，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更是需要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事业。

旅游——旅游在哈尼梯田的发展决不能走竭泽而渔的道路，而应该开展资源保护与发展利用相平衡的生态旅游。目前哈尼梯田在推动农家乐形式的家庭旅游产业，这使村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对村民自觉维护梯田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应该注意，从传统均衡的农业经济，转向出现贫富差距的旅游经济，对社区群体、传统信仰是有一定冲击的。

旅游产业的推进，要有科学的发展目标，合理的发展规划。在哈尼梯田遗产管理规划中，我们提出把大型旅游服务设施建在新乡、胜村、攀枝花等

几个镇上，而不是分散在村寨中；采用公共交通换乘，而非自驾游到田间地头的形式，就是希望未来将旅游压力对遗产地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 共享保护

使遗产地的原住民共享保护与发展的成果，这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理念，哈尼梯田应该成为示范。要建立农户补偿机制，让村民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并受益，使他们有扎根乡土发展特色旅游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留住年轻人，留住人才。

### 维护传统价值观

传统文化与信仰系统的丢失导致遗产的衰落、社会结构巨变的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因此这在哈尼梯田的保护中是重中之重。

哈尼人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到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审美观等意识形态，再到哈尼梯田种植的稻米、养殖的鲜鱼，直至所居住的蘑菇房、穿戴服饰、饮食习惯等等，都是哈尼梯田文化的独特构成部分，无一不是从梯田生活衍生而来。这样的传统文化习俗信仰正是维系哈尼梯田存在的根源。

今天它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说明传统的文化系统是非常有效的，而我们所需做的就是了解它，认同它，并且用尊崇、敬畏之心去维护延续。

有两方面工作是当务之急：一是对民间文化的扶持，应当设立多层次的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文化团体，大力挖掘哈尼文化，构建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体系；二是开展科普教育、展示传播的工作，对居民及外来游客加强宣传，使其了解哈尼梯田的价值，热爱、传承本地文化，改良生产技术，尊崇当地习俗传统。

### 保障劳动力资源

哈尼梯田人地矛盾突出，人均0.86亩的耕地本就极少，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梯田的开垦已经达到了极限。离开梯田外出打工的人大多是短途打工，并且大都能够能够在插秧和收割季节回家帮忙，梯田劳动力流失的情况并未出现。反而，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当地村民只好通过增加单产和改变用地结构实现增收，做法之一就是先将林下植物清除以便种植收益较高的草果等，而林下种植草果就会使森林弱化蓄水能力，降低生态弹性。

因此，与菲律宾伊富高水稻梯田由于劳动力流失而导致濒危的问题不

同，哈尼梯田恰恰反而需要疏解部分劳动力人口。我们可以仔细地思考应对策略，通过全面的劳动力资源调查，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合理规划劳动力资源分配，使遗产地的整体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相平衡。

###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很多农户家的居住条件很差。哈尼梯田遗产区农户1.1万多户中，生活在传统或半传统民居中的农户就有3000-4000户，其中15%-20%的农户家庭居住条件相当艰苦，常有一个家庭七八个人（两代甚至三代人）共住一间卧室。保护哈尼梯田应该从保护梯田上的主人开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哈尼梯田可持续保护和发展的长远保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是当务之急。

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以《红河哈尼族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环境治理导则》作为依据，在遗产区内开展的试点工作得到了村民的热烈支持，说明了由政府提供补贴，村民自己动手参与的方式是可行的，将现代化的厨房、卫生间引入传统民居的方式是可行的，但是未来的推广是更大的任务。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元阳梯田的灌溉沟渠90%以上是土沟渠，沟渠渗漏及工程性缺水，造成部分梯田得不到有效灌溉，面临干涸危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化。但是全面的对沟渠硬化，又需要对沟渠的样式做很好的设计，才能不影响景观的视觉效果，这需要细节的工作。

在遗产管理规划中提出了在村寨集中设置水处理系统，使生活用水净化后流入梯田的措施，这样的措施也需要尽快的组织实施。

### **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

毋庸置疑，生态保护是哈尼梯田存在的基础。在过去的数年间，随着现代行政管理制度的介入，哈尼梯田也逐步形成了传统机制与现代行政管理相匹配的有效的生态保护体系，对物理要素山、林、水、田的保护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疑，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机制是相对最为健全，也是令人对未来最充满信心的方面。

###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学、经济学等超越了传统遗产保护领域的学科介入，随着更多社会力量的介入，随着更多的讨论与思考，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哈尼梯田的价值，制定整体的、综合的保护与发展策略，一定能

够找到一个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人对哈尼梯田遗产价值的延续。

（作者：自游乌托邦）

##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精心设计和良好管理

【中国旅游报2018年2月28日】近年来，全球国际旅游发展有了明显好转，无论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还是世界旅游理事会都对此喜形于色，对全球旅游发展形势充满信心，相继做出了颇为乐观的预测。值得欣慰的是，包括这两个权威机构在内的不少旅游研究机构，都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面对一片看好的欢呼之声，又都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警示，那就是全球旅游发展正面临着“过度旅游”的挑战。

2017年年底，世界旅游理事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应对成功：旅游目的地的拥挤管理》的报告，直面世界旅游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过度拥挤难题。无独有偶，同期德国IPK国际旅游咨询机构代表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ITB）发布了题为《繁荣还是萧条？旅游走向何方》的世界旅游趋势报告，这个报告中有个专题，叫做“过度旅游：国际旅游业需要制定新战略来管理”。因而，不少旅游相关媒体曾把“过度旅游”的标题推上了头条。看来，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相关管理部门和业界予以关注。

世界旅游理事会的报告对“过度旅游”阐述更加全面，但作为旨在促进旅游发展的业界领袖的组织，该报告中使用的语汇是“旅游目的地的拥挤”，描述的是一种现象；而IPK的报告使用的是“过度旅游”，显然，后者突出的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两个报告都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

世界旅游理事会详细分析了“拥挤”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提出的挑战，这包括“异化了的当地居民、衰退了的旅游体验、超负荷的基础设施、对自然的破坏和对文化与遗产的威胁”等五方面的表现，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当采取的措施建议，其中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舒缓游客人数、向不同的地点疏散游客、调整价格以平衡供求、调节住宿供给能力和限制可进入性及活动频率”等，但强调，对待这一现象要从长计议，重视长期规划，而不应机械

反应，慎用一刀切的对策。

IPK的报告在阐述“过度旅游”的影响时特别强调，“过度旅游”不仅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居民，还影响着旅游者本身。显然，这一阐述更加全面。报告提出，据“世界旅行监测”2017年对世界24个国家29000名国际旅游者的调查显示，25%的被调查者承认对其旅游目的地有“过度旅游”的感觉。报告分析，世界上大约9%的游客（约1亿人）的确感到他们的出境旅游质量受到了影响，其中带孩子出游的家庭和34岁以下的年轻人对这一影响感受最深。从地区来看，亚洲出境旅游者对“拥挤”现象更加敏感。

IPK的报告中提出，现实与公众的认知有所不同，真正受影响最深的并不总是大城市，冬季的滑雪度假地更加严重。也就是说，“过度旅游”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并非局限在城市。调查还表明，大约十分之一的国际旅游者表示，他们的旅游度假、邮轮旅游、城市游览、阳光海滩度假和乡村度假质量都受到了影响。最有意思的是，越是世界有名和区域有名的景区景点，拥挤问题越显严重。

IPK国际旅游咨询公司CEO弗雷塔戈表示，“过度旅游对自然、文化、当地居民和旅游者来说都不是件好事，但对全球旅游来说并未达到极限。很多旅游目的地还是觉得旅游者多多益善，无论是一年四季或是在淡季皆如此”。

总之，这两个报告都确认“过度旅游”是当前全球旅游发展中最为值得关切的问题，呼吁国际旅游行业要与相关的旅游目的地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难题。同时也承认，过度旅游问题颇为复杂，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成因，解决这一问题也并非易事。IPK报告引用德国海洋旅游研究所所长的话说，“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过度旅游，而是旅游管理水平的低下。因此，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所以，要认识过度旅游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制订长远规划及相关政策，改善管理理念、方式与技术，做到未雨绸缪，而不是削足适履。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投资、城乡旅游化以及旅游营销等都非常火热，各地对于旅游促进整体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建设以及开发接续产业和扶贫济困等方面的作用有着很高的期望。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

到，近些年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增速放缓，必须考虑国际社会对我国“过度旅游”因素的困扰。尽管这一现象出现的背后原因非常复杂，但他们会从国人如此热衷于出境旅游的原因去思考。因此，无论是旅游管理部门还是业界，在期许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关注一下“过度旅游”这一世界旅游发展新趋势。不能忽视它对自然、社会、文化、体验等方面造成的威胁与破坏的后果。对“过度旅游”问题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显然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动用禁令或限令的直接干预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能实现理想的目标。

其实，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几年来采取的限流措施与产生的效果就为同行树立了标杆。由此说来，恐怕这是面对世界旅游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联合国确定2017年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该组织近年来所提倡的那样，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精心设计和良好管理的旅游”。

（张广瑞）

## 时事评论

### “一部手机游云南”关键要确保精准度

【云南网2018年2月23日】春节期间，云南民族村迎来旅游高峰，景区从最初的窗口售票到现在的信息化普及，已实现线上线下售票一体化，从人工检票到电子验票，都在不断进步。“目前我们已完成了‘一部手机游云南’专用通道，也就是人脸识别通道的建设。未来，游客将可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APP获取详细的旅游信息和推荐。”景区管理人员介绍。（2月22日《云南网》）

今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一部手机游云南”为平台打造“智慧旅游”，让“游客旅游自由自在”。从这个春节情况看，“一机在手，旅游不愁”成为不少来滇游客的切身感受。

其实，进入信息化高速时代，“智慧旅游”建设已成为旅游快进键的重要按钮。而“一部手机游”也并非云南的专利，比如甘肃就提出，2018年5月底前初步实现“一部手机游甘肃”，使“一部手机游甘肃”成为游客出行的“金牌导游、贴心管家、文化导师和全能导购”。

随着活动半径的不断延伸，外出频次的不断增多，使得我们下一秒就可能成为游客。于是立马掏出手机来搜索吃的、住的、玩的。不过，这样的普遍性选择习惯，也对“一部手机游”的精准度提出了高要求。

同样在这个春节，我和家人在某个城市所遭遇的“手机游”却是连连不爽。先是搜索机场附近的旅馆，明明看好的一家旅馆导航带我们来的却是另外一家，且环境脏乱差。紧接着，搜索到的一处景点闭馆时间明明显示18:00，偏偏提前到17:00。当问及为何关门时间与网上显示不一致时，工作人员“网上的怎么能相信”的回答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还有网上推荐的景点，居然存在宰客乱象，拍摄的照片说好10元一张，偏偏要收25元一张。

人们之所以更加的依赖于手机，因为它确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但如果各种信息总是真真假假、鱼龙混杂，在遭遇“南辕北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重重打击后，还会不会对手机大声说“明天依然爱你”还真是个问号。

值得反思的是，“一部手机游”由政府部门主导，如果推出的信息总是失真，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是否会下降，而“智慧旅游”建设会不会面临危机？

如何确保信息的精准度，为游客提供智能、方便的旅游服务，从而真正发挥出“金牌导游”、“贴心管家”的奇效，可以说这是“一部手机游”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评论员：李强）

## “旅游+”助力春节游

【人民日报2018年2月22日】去古县城看民俗表演，到城市参观工业博物馆……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出游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统计显示，仅春节假日前4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同比增长均超过10%，而

度假休闲更超越景点观光，成为居民春节出游的第一动机。不是热衷“到此一游”，而是更注重出游的舒适性和趣味性，春节期间的旅游市场就像一个切片，折射人们对旅游供给侧改革更高的期待。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休闲、娱乐方式的转变，也在无形中扩大了阖家团圆的地理概念。不管是选择到海南晒太阳、到北方看冰雪，还是去新西兰体验开飞机、去冰岛蓝湖泡温泉，“带着家人去旅行”的观念日渐普及，消费者的旅游需求日益个性化、多样化，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成为大势所趋。

最近几年，一些曾不愁收入的5A景区日渐冷清，而一些冷门景区，却因精心策划特色旅游线路、服务规范、旅游体验好而火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快节奏简单观光游正在被加速淘汰，在新的旅游产业结构中，非景点旅游（到景点景区之外）的游客超过八成，想住农村民宿的比住宾馆饭店的人多。有业内机构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今年春节个性化向导服务受到青睐，多个家庭一起旅游的订单大幅增长。这些为旅游目的地改进管理、配套更具针对性的服务，提供了值得深挖的观察角度。

“游客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改正什么。”有人曾用4个“什么”来概括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的确，全面提升旅游的品质和品位，首先得充分理解游客“挑剔”眼光背后的期许。不仅仅是消除“出门在外，怕被宰，更怕被宰了没人管”的担忧，建设质量有保障的服务体系，丰富“旅游+”的融合发展方式，刷新人们的出游体验等等，同样也是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客人的时间，是最需要争夺的刚性资源。当诗画江南“村村有景点、处处可游览”，当内蒙古大草原上一杯牛奶的诞生都能用手去触摸，这样的体验才能让人留下来，与相关服务行业产生良性互动，有效盘活区域“大经济”。

面对火爆的旅游市场，哪个地方能吸引住游客，关键看“旅游+”的努力。除了提高旅行社、酒店、景区的服务质量，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风貌、市场规范等软环境建设，也被很多地方旅游服务部门纳入管理视野。毕竟，目的地的旅游质量，是由景点所在地区的整体综合环境决定的。吃、住、行、游、购、娱，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即使发生在景区之外，都有可能引起游客的吐槽。尤其是节假日，平常被忽略的服务缺失，会因为游客激增成倍

放大。无论是江苏提前发布全省重点景区周边区域“易堵地图”，提示游客合理避开拥堵，还是重庆强化对旅游包车、旅游餐饮、饭店火灾执法检查力度，推动实施重点景区节假日流量管理，春节期间各地查漏补缺、优化旅游环境，正是为了去除供需间的“梗阻”，挤掉旅游接待中的水分，方便游客于自在行走、游目骋怀中，提升旅游的获得感。

随着带薪休假、小短假的逐渐普及，“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将成为不少地方的旅游常态。鼓励游客来“游个遍”，就得保证他们能够“放心玩”。当“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旅游才能成为促人快乐、令人幸福的产业。

（吕晓勋）

## 世界遗产

### 世界遗产运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平台

【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16日】1987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久的中国首批提交申请的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处名胜古迹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已经30周年。30年来，不仅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遗产热，世界遗产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世界遗产热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现象。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前半段是热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卷入了当时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数千万生命成为炮灰；后半段是冷战，世界被两种意识形态的铁幕分割并尖锐对立，数万枚核弹相互瞄准，双方都时时威胁准备按下具有终极毁灭意义的按钮。20世纪的人类也进行了全球化时代最具创造性的制度探索，包括在二战之后创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试图从体制安排上消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创建教科文组织，试图促进和平文化建设，实现人类在智力上和道义上的提

高与团结，从思想观念上制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在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下，文化与自然遗产因其珍稀和直观性以及千百年来凝结的不言而喻的普世意义而成为对话的良好突破口和对立中的一抹亮色。从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海牙公约首次明确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和价值观，到1960年苏联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美英法等发动对淹没区文物古迹的国际性合作抢救，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出台，“共同的遗产，共同的责任”成为全球性共识。进入新世纪之后，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辅相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制定的这一系列与文化和人类遗产有关的国际性重要文件，构成了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其中1972年公约是迄今为止缔约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国际公约，公约所设立的《世界遗产名录》更是成为教科文组织最具号召力的旗舰项目。

上述公约虽然多冠有保护之名，其内容却并不完全仅仅是关于保护。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例，列入名录的遗产千百年来原本就一直在那里，因为有了公约，它们才被重新认知、评估，其真实性、完整性被在信息传递与价值传承角度重新定义，其突出而普世的价值被系统归纳为六个不同的方面，而20世纪一些人类的天才创作也引起关注并被纳入，围绕遗产申报和保护、监测、传播、利用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标准，以引导世人从历史、科学、工程、美学、社会等各个角度围绕遗产展开对话，寻求共识与合作。世界遗产成为一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事业。

中国虽然加入公约较晚，但是我们快速追赶，后来居上，已有50余处遗产被列入名录，成为总数第二的遗产大国。经过这30年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完全不了解世界遗产，到开始熟悉世界遗产的规则，再到在整个世界遗产的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分享中国的遗产和智慧，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的推动力量。30年来，由世界遗产引领，我们对文物和遗产的认知、保护、利用、管理各项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30年是中国从文物保护单位向文化遗产保护跨越发展的30年，全社会普遍认识到文物和遗产是宝贵的财富，是发展的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兴，必须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俗话说三十而立，在参与世界遗产运动30周年之际，我们既应该全面盘点收获，也应该深入反思世界遗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在20世纪、在未来的实质是什么？依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验和认识，我们还可以对世界遗产运动做出怎样的贡献？

毫无疑问，每一个被列入名录的项目都独一无二，50余个中国遗产更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群体和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它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也在与其他世界遗产和其他文化文明的比较与对话中让我们重识遗产，重识自我，重构认同。同时，参与既意味着共享，也拥有世界性意义，至少是文化与自然多样性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它们作为祖先创造、传诸后人的本体特色、过程特色，也应该寻求它们对于当代人、未来人和全球化时代所有人新的意义。

为了提升申报、监测、管理、研究等世界遗产相关工作，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中心参与的首个申遗项目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该项目2013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总结经验，2017年该中心特别组织了重返哈尼活动，结果却发现尽管成为了世界遗产后让梯田和哈尼更加出名，游客更多，但却有更多的当地年轻人出去打工不愿意回来，而哈尼梯田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他们的回归和参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以什么样的定位和措施来吸引年轻人重返自己的家园？如何理解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的相关要素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这一问题也应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到底谁是遗产的主人这一常被挂在嘴边的深刻问题。如上所说，遗产是先人创造并传诸后人的，但是在具体的遗产地则有着不同的实际问题，也开始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参与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维系。先人及其后代、原住民、当地人、包括游客在内的外来人、遗产和相关专家、政府部门等等，还有未来世代的人们，都可以称为是遗产的利益攸关方，或者遗产主人。入选世界遗产，也意味着保护的主体、内涵、标准与价值、功能诉求的日益复杂化。世界遗产很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共

同的遗产，这种共同性和公共性不仅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文化与文化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提出了重构人与遗产关系乃至重建遗产社区这样的基本需求，因此，围绕具体遗产地的这种共同和公共性是圈层式、网络式的，而非单一的或者金字塔式的。历史上，人们曾经为了财产和不同的信仰而头破血流，而每一个人类社群共同体的建构——小到家庭、家族、团体、机构，大到民族、国家，都是漫长的生产、生活历史千锤百炼的结晶。那么，未来的遗产社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又如何运作？

今天，全球化历程已不可逆转，好在我们已经拥有包括共同的遗产这样一个串起古今未来的更好的信息交流媒介与沟通方式。世界遗产事业昭告全体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基因，共同的遗产，有共同的过去，也有共同的地球家园和未来，人类作为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也必然有着风雨同舟的共同命运。因此，围绕世界遗产提升认知，开启对话，为了未来，保护过去，打造让历史、现实与未来会面的更具科学审美和理性的对话平台，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创新利用，追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尤其是遗产专业机构的共同责任。

（作者：曹兵武）

## 中国世界遗产城市的价值及其保护与发展的借鉴意义

【城市规划学刊2018年2月26日】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城市中，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澳门历史城区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陆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不仅拥有特色鲜明的城市景观，更因为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体现出先民们在追求和谐理想的人居环境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以及表现出来的东方智慧，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经验。

### 中国世界遗产城市的价值

#### （1）东方的哲学思想

“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和“天人合一”的人居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城市中非常好地互相配合着，构建出一个个既有家国秩序，又有宜居环境的中国

城市。

平遥古城作为中国中原地带的建制城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制中庸”的建城思想，同时在城市选址、民居院落、城市景观的处理方面则又体现出对“天人合一”理想人居环境的追求。丽江古城是在比较艰苦的自然环境下，由商业贸易集镇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在大的格局上首先充分利用了山、水等自然要素，并形成了看似无序实则有机的城市形态，但是随着后期中央政府统治的加强，在城市布局以及民居院落中亦体现出规制的作用。

### （2）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共生

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虽然在起源、历史发展、物质形态等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是它们在历史上都能以开放的胸襟、兼容并蓄了多元文化和多元社会阶层。

平遥商帮在走南闯北的过程中累积了无数的财富和经验，城市的繁荣带来了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同时能工巧匠云集，造就了精彩纷呈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是滇川藏大三角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和重要的“茶马古道”。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纳西族先民吸纳汉、藏、白等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澳门历史城区是16世纪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随着传教士、商人的跨海国际航行，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见证了东西方美学、文化、建筑和技术影响力的交融。

### （3）文化的多样性表达

历史城市是世界上各个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等背景下形成的城市型聚落，是一种集体智慧的体现。历史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结构或者经济分工和联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了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其内涵既有显性的物质形态方面的杰出表现，又有隐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在人类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技术史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中国世界遗产城市保护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与发展体现了中国的历史城市在保护与发展方面的不断探索。

### （1）乡规民约与居民自发性保护的重要性

乡规民约往往是中国的历史城市智慧的体现，其重要性亟需得到重视。

在丽江，东巴经中说，人与“署”（整个自然界化身的超自然精灵）本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后来贪婪的人类过分侵扰自然，污染河流，乱砍滥伐，滥杀野兽，冒犯了“署”，结果兄弟成了仇人，人类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洪水横流，百病丛生。

人类在惊恐无奈中只好祈求神灵、东巴教祖师和大鹏神鸟来调解。最终，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劈山炸石，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这两兄弟又重续旧好。

在平遥，自古以来民间自行组织捐助保护古城，维修文物等公共设施，代代相传，蔚然成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文物管理机构瘫痪，但是平遥古城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居民想方设法冒风险保护文物，使得城墙、市楼、文庙大成殿、清虚观等古建筑和传统民居免受大的破坏。

### （2）“保护古城，建设新城”——1980年代城市规划的创新实践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外的零星建设是当时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那么1980年代平遥与丽江在新的城市大发展阶段及时采取了“保护古城，建设新城”的城市规划理念，并且按照规划逐步实施，从而避免了历史城区的建设性破坏，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命运，有效地保存了独特而又完整的古城风貌，因而在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3）“整体保护，和谐发展”——新时期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新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遗产城市面临新的问题，更需要强调双重目标：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保护居民的利益。

作为一个活态的世界遗产地，我们强调整体性的保护，而非单体纪念物式的保护。因此，保护的内容包括古城空间格局的保护，古城天际轮廓线的保护，古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统经济的发展。在保留古城居民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公-私合作的长期的“循环式”的传统民居改善计划，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的补助和所有的符合条件的居民私人资金共同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通过补助契约以及积极建立新的社区中心的形式使得居民乐于

继续生活和工作在古城中，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邵甬）

## 环球博览

### 数字技术与虚拟文物：是珍贵遗产的护卫者， 还是文物灵光的剥夺者？

【界面新闻2018年2月4日】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数字测绘这些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遇到经历时光洗礼、至今备受珍视的文物时，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方兴正艾，直接导致了“数字遗产”（digital heritage）的出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定义数字遗产的：

“人类知识或表达的资源——无论是文化的、教育的、科学的、行政的——或者包含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类别的信息正越来越多地被转换成数字虚拟资源……许多这些资源拥有长久的保存价值，因而构成一种值得为了当下和后世妥善保护的遗产。这种遗产可以以任何语言出现、可以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反映人类知识或表达的任何方面。”

教科文组织指出，数字遗产很有可能会越来越普及，个人、组织与社会群体将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来记录、表达他们所重视且希望为后代流传下去的事物。事实的确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技术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数字遗产在“保护”以外还具有了其他的意义，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或重塑了遗产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本质。

然而，当我们观赏那些外表与原作别无二致的佛像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看什么？它们是否仍然具有与传统和崇拜仪式密不可分的灵光（aura）和原真性？还是就如本雅明所指出的，在机械复制时代来临后，大量复制生产的作品不再有原真性、灵光亦开始衰退？虚拟的数字文物可以取代真实文物吗？这一话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 最后一根稻草：挽回消逝的文化遗产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数字技术是挽回消逝的文化遗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从2003年开始着手进行阿富汗巴米扬佛像的保护工作。巴米扬佛像位于巴米扬山谷，于公元6世纪用红色砂岩雕刻而成，然而其中最大也是最负盛名的一尊佛像（高38米）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2003年3月，巴米扬山谷及其考古遗址作为“犍陀罗国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6年秋，德国亚琛大学与维也纳技术大学合作，使用3D激光测量系统和尼康数码相机勘测巴米扬大佛的壁龛及周围的洞窟结构，获得了这个损毁严重的壁龛的精确、逼真的3D模型。随后，研究人员利用历史文献和图片，制作了一个虚拟3D模型来还原巴米扬大佛。在这个虚拟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人员有望在未来复建部分或整座佛像。

数字技术还帮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挽回了一个悲剧性失误。2002年10月6日晚间，一尊亚当像因基座突然碎裂而倒地，遭到严重损坏。这尊大理石雕像由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Tullio Lombardo（1455年-1532年）制作，于1936年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永久馆藏，是北美地区最重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

在从意外发生的震惊和沮丧中恢复过来后，大都会博物馆决心尽最大努力修复这座亚当像。来自馆内和馆外的文物修复者、科学家、工程师、图像专家齐心协力，在整整12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将雕像修复如初。

亚当像碎裂成了28个大块和上百块小碎片，幸运的是，头部、脸部和躯干相对而言完好无损，然而手臂、下肢和装饰用的树干损毁比较严重。事故发生后不久，博物馆文物修复者、保护专家和策展人在外聘材料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协助下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合作项目，试图找到修复雕塑的最佳方法，并为未来的大型石像修图提供参考。

修复工作从2003年开始。研究人员使用3D激光扫描了所有的碎片，激光扫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许多研究手段，包括有限元分析和结构工程调查，后者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碎裂的成因和雕像各个部位的压力点。研究人员还对保护材料做了大量的研究测试，确认了修复雕像的最佳黏合材料。2014年，当

修复完毕的亚当像再次展出时，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任何它曾经碎裂过的痕迹。

对很多人来说尚属新鲜事的“众包”（crowdsourcing）甚至也被运用在了挽救文化遗产上。2015年2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博物馆大肆破坏了大量文物，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两位博士生，Chance Coughenour和Matthew Vincent，于当年2月底在网上发起了“摩苏尔计划”（Project Mosul），邀请曾经参观过惨遭蹂躏的摩苏尔博物馆及周边地区的网友上传他们此前在该地区拍摄的照片。对“网络考古”感兴趣的网友可志愿加入计划，帮助归类图片，使用科技手段在网络空间里重建被破坏的文物。

这种手段就是摄影测量法，这种测量法能够通过软件将数张拍摄同一个物体的2D照片转换为3D图像，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术，仅仅是普通数码相机拍摄出的照片就能被用来制作3D模型了。” Vincent在接受BBC的采访时表示。

目前，摩苏尔计划已经收到了6194张照片，正在进行制作的3D模型项目为129个。“这些模型不具备我们用校准照相机、激光扫描等手段制作出来的模型那样高的科学价值，然而这些3D模型仍然具有可视化价值——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已经不存在的文物曾经的模样，我们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复制出身处博物馆的体验。”他说。

### 3D打印佛像：以假代真是保护还是亵渎？

3D打印是一种日益流行开来的新技术。凭借这种手段，人们可以快速制作出任何形状的立体状物体。3D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应用场景是为新产品的研发快速制作模型，然而有趣的是，日本的一些寺庙开始利用3D打印技术来复制古代佛像。

2010年，日本歌山县立技术高中的一群学生在“工业设计”课程中启动了一项特殊的项目：他们与当地一座盲人学校合作，花了6个月的时间，使用3D打印机复制了当地一座著名的爱染明王像。因为材质为塑料，所以可以让有视觉障碍的信仰者随意触摸佛像。

然而很快学生们就发现，这尊3D打印佛像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据统计，在2007年至2009年间，日本佛寺有105件被列入文化财产名录的文物被

盗窃，其中20件位于歌山县。近年来，日本部分地区人口减少，这里的住持往往需要同时打理数座寺庙，这为盗窃分子带来了可趁之机。

据日本媒体报道，岛根县江津市清泰寺住持井下智泉将寺内珍藏的一尊木质阿弥陀如来像（岛根县文化财产）送往岛根博物馆收藏，并从2015年5月开始在寺内供奉3D打印的复制品。井下住持认为，3D打印技术的低成本和精确复制能力能够帮助寺庙更好地保护佛像。

“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来永远守护佛像了。但有了这尊3D打印的复制品，只要它还被供奉在寺庙里，人们就能轻易地感受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D打印佛像的做法在中国国内也存在。2017年12月，按1:1比例用高分子树脂由3D打印制作而成的云冈石窟第三窟西后室正式亮相青岛城市传媒市场，引起了文物爱好者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这座复刻石窟严格按照石窟内的原貌复制，一边是高达10米的主佛阿弥陀佛造像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组成的“西方三圣”，一边是斑驳风化的砂岩墙壁，中间有两根立柱，上面的洞龕内还有一尊尊小型佛造像。整个石窟的制作历时两年，参照拍摄的30万张照片，用842块模型拼接而成。

复原采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与多图像三位重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高保真重建了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彩色三维模型，而后通过引入国内自主研发的高精度3D打印机，通过计算机三位激光扫描技术结合3D打印铸模技术，复制文物的所有细节，达到文物材质及色彩纹理上的高精度还原。

### “数字文物只可能无限接近文物，但永远不可能取代”

上海纽约大学交互媒体艺术助理教授陈无畏表示，平时他与同事交流时，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传统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因此只有虚拟文物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然而他本人的看法是，“数字文物只可能无限接近文物，但永远不可能取代”。

陈无畏将数字三维可视化、交互动态图像设计、数字雕塑等技术融入数字文化遗产内容的开发中，并在上海纽约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除了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的学生，数学、工程、艺术系的人才都能纳入其中。

2016年，陈无畏前往重庆，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进行一项数位档案项目。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时期的摩崖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儒、道教

造像并陈，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媚态观音像，该雕像曾因其向左方俯视、微笑中带有一丝羞赧的独特造型而被梁思成点评，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化，媚态观音的笑容已经不复当年那样清晰。

像媚态观音这样的文物正在环境变化和人为破坏中日益凋零，文物数字化由此显得尤为必要，文物或可借此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于后世。陈无畏撰文表示，大足石刻网络建档项目在通过开发数字遗产内容来保护实体文物和遗产地之外，也希望能够将这些数字档案通过出版、展览、研讨会、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各种渠道传播出去，这个项目积累的经验与知识也可被简化应用到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特别是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总称）。

若我们将数字遗产视作公共教育和知识普及的一种手段，那么其是否具有灵光和原真性的问题，就应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考量了。事实上，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Bruno Latour与哥伦比亚大学文物保护副教授Adam Lowe合著的文章《灵光的迁徙：如何通过复制品探索原作》（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 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 similes）指出，我们对查明是否是原作如此痴迷的原因，恰恰正是因为质量越来越高的复制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换言之，追求原作的强劲动力取决于它的复制品能够激发起多大的激情和兴趣。没有复制品，就没有原作。要想在某一样物品上打上原创的标签，你需要在它的表面施加只有大量复制品才能提供的巨大压力。”

因此两位作者认为，在对“但是这是一件复制品”的“指控”做出下意识的判断之前，我们应该拒绝鲁莽地评价原作或其复制品的价值差异，因为复制品实际上也是原作不断被重新书写的档案的一部分。“复制品，特别是那些依靠复杂（数字）技艺制作的复制品，是探索原作最有成效的一种方式，它们甚至能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原创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遗产一直与我们同在，也一直在被人们的现实考量和现世经验所不断改变。英国学者Dennis Hardy将遗产视作一个“价值负荷的概念”（value-loaded concept），意思是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它的本质都完全取决于所处环境。《不和谐的遗产》（Dissonant Heritage）一书指出，“现世从一个

想象的过去中选择继承什么为当下所用，并决定什么应该被传递给一个想象的未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遗产都是由当下塑造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应放在我们当下的时间与空间体验中来理解。

当遗产借助数字技术在虚拟世界获得新生时，它亦是人们对其价值做出的又一次谨慎判断和选择，肯定了遗产对于当下的意义。而当文物以数字遗产的形式存续于更多没有渠道能够直接接触原物的人们的想象中时，它的真实性，或许能够部分消弭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对立，确认我们应该珍视什么及保护什么。

（林子人）

## 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镜鉴（下）

【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1月刊】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近期的相关工作包括体制试点评估、整合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2017年年底结束的体制试点工作，在治理结构、治理规则、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处理及进行跨行政区的管理等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迄今只有中央特别支持的三江源大体形成了统一、规范的管理，而武夷山等试点区相关工作出现了多方无积极性的尴尬局面。借鉴法国经验，我们认为对这些主要问题可从以下方面破解。

1. 上下结合的治理结构才可能发挥各方所长并得到各方支持。中法两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同，中国的高价值保护地所处区域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土地权属复杂、原住民数量较多、发展诉求较高、替代产业发展条件不佳，这使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人、地”约束突出，必须从体制上解决“钱、权”难题。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垂直管理，会面临至少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管理机构掌握的土地产权比例大多不高且治权有限，往往还存在多头管理，难以实施对人、财、物等资源的统一、高效调配；二是能力结构单一且力量有限，仅依靠中央层面管理者的管理手段和行政力量，难以处理土地权属带来的问题，难以调动各方面力量；三是相关决策难以充分反映各利益相关方诉求，难以形成“共抓大保护”的合力。前述法国国家公园体制的三方面特点正好可应对这三方面挑战。

2. 多方得利的绿色发展才可能形成保护合力。中央提出“共抓大保护”

的思路，其核心在于“共”字，即要致力于形成各方协作的合力。与其他保护地类型相比，国家公园以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保护目标，包含的面积更广；以全民公益性为平行于生态保护的核心管理目标之一，涉及的利益维度更复杂。为此，需要形成普遍的正向激励机制，在国家公园管理中涉及的各级政府及部门、多数社区居民、广大社会团体等之间形成联动。上述上下结合的治理结构只是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激励，但要确保基层地方政府、社区和相关企业也加强保护，就必须形成新的激励方式。换言之，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的初衷，必须对“钱、权”相关问题有各方支持能得“利”的解决方案。法国国家公园管理中采用的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和对社区、行业的全方位扶持就是一种有效的多方得利模式。而在中国，武夷山试点区（其中的自然保护区）的茶产业在完成资源—产品—商品的升级后，初步形成了多方得利的帕累托改进，但其绿色发展方式需要体系化、制度化后才可能确保产品在保护地友好的前提下稳定增值从而在全国普遍化。而且，形成了环境友好和社区参与的绿色发展模式后，国家公园的人地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从管理角度而言，即使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核心区，也不必都一刀切地采用所谓生态移民的方式，而是根据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分类处理，只要满足基于科研的保护需求即可，不必都要移民、都要改变土地权属。《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鼓励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等方式，共同保护国家公园周边自然资源。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就已说明这样的发展方式适用于中国国家公园。

3. 法规、规划、标准等合理化、体系化后才可能真正指导实践并形成推广标准。改革需要改之有利和改之有据，但目前的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法规标准方面存在一些显著的缺陷：一方面，诸多依据缺失或不配套，甚至部分法规条文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另一方面，原有的相关法规（比如《自然保护区条例》）、标准（比如相关保护地的划定和分区标准）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也罔顾了操作层面的困难。法国国家公园管理中的宪章，不仅是体系化的依据，且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历了多方博弈、具备了操作层面的可行性，因此才可能避免“下有对策”的情况。另外，法国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中有专门的城市规划部门，对所辖市镇的规划方案进行统筹审核，以确保与宪章相吻合。中国的相关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依据

合理化、体系化。比如目前在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所在地浙江开化形成的多规合一暨审批合一平台，就初步实现了规划层面的合理化和体系化。未来如果将其拓展到法规和技术标准层面，且采用多方治理模式下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共同签署、监督执行的模式，则也有可能达成法国改革后的局面。

4. 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跨行政区的统一管理。上下结合的治理结构和多方得利的绿色发展都需要在跨行政区管理模式下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价值。法国国家公园的加盟区就是以国家公园宪章指引的绿色发展为纽带、打破地域限制，实现跨行政区的统筹治理和多方得利的管理模式。这种统一管理的优势除最大程度地团结周边区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借助目前在某些地区业已形成的多规合一、审批合一平台，在没有改变区域隶属关系的情况下，更好地形成信息共享和规划协调，在巡查执法、项目审批等方面实现统一管理。

总之，中国的国家公园及其体制建设，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约束并博采各家之长。美国的公益性理念及地役权等相关体制创新，法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验等，均对解决中国的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总体方案》已经在治理结构、绿色发展等方面将这些借鉴局部体现出来，未来的法规调整、标准设立和机制创新中若能更多地将国际经验本土化、制度化，2020年设立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就可能顺利完成。

（苏红巧、苏杨、王宇飞）

---

编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网址：[www.china-npa.org](http://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mailto:china_fjms@163.net)

电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真：010-88315325（F）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张立 陈晨 邮编：100044

---